

# 同治晚期直隶赈务 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

朱 浒

摘 要：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起点，是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以往认为它是出于李鸿章的着意安排。其实，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同治十年直隶爆发特大水灾的意外事件，最终促成盛宣怀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契机。深入探究这一过程，揭示盛宣怀个人的一段隐微历史，有助于理解洋务事业从顶层设计落实为建设实践的复杂进程，从而拓展洋务运动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灾荒 盛宣怀 李鸿章 轮船招商局 洋务运动

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办，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节点，标志着洋务运动从“求强”为主的阶段转入兼重“求富”的阶段。作为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的盛宣怀，正是从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开始，才正式走上洋务之路。可是，招商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得以创办，盛宣怀又何以能够参与筹办活动而走向洋务之路？按照风行说法，这是一条简洁明了的路径：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一手策划的行动，而盛宣怀自投入李鸿章幕府后，备受李鸿章信任，李鸿章亦着意将之栽培为洋务事业所需人才，所以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sup>①</sup> 其实，这个说法的基础并不坚实。遗憾的是，以往由于资料限制，特别是各类已刊、未刊的盛宣怀资料中，反映盛宣怀介入筹办招商局活动的记载十分稀少，从而使得对这种说法的质疑很难落到实处。直到 21 世纪初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才出现了足以质疑这种说法的重要线索。这些线索表明，盛宣怀通过介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而走向洋务建设的道路，决非是成说所描绘的“坦途”，而是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同时，盛宣怀的这一历程也表明，对于洋务事业从顶层设计落实为建设实践的具体过程，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① 这种说法最明确的阐述，见于两部以盛宣怀为中心的专著。其一为 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的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61-62)，该书中文版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吴乾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其二为夏东元的《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8 页）。在一些以洋务运动为主题的研究中，如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349 页）以及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第 28 页），也是较为典型的例子。而在关于盛宣怀的通俗类读物中，皆属对此说法的发挥。

## 一、从军之路的阴云

在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问题上,风行说法的基础并不坚实。首先,这个说法的论述依据,主要来自于一份二手资料,即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于1919年刊行的《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行述》是对盛宣怀与洋务事业结缘的最早概括和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了解盛宣怀在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之前活动情况的最宝贵资料。其次,除《行述》作为二手资料的属性之外,其所叙述的“事实”和叙事逻辑之间,也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疏漏。由于此前尚未有人揭示过这种“事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对《行述》所述盛宣怀从入幕到筹办招商局的历程,进行一番考察。

按照《行述》的结构,盛宣怀的这一历程被分为三个相对完整的环节。<sup>①</sup>第一个环节描述了盛宣怀从同治九年夏初进入李鸿章幕府到随李鸿章前往直隶的情况。盛宣怀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主题是从军而建功。首先,盛宣怀在李鸿章受命“由鄂督师入陕,防剿回逆”时,加入淮军。李鸿章在军营“帷幄需才”的情况下,委派盛宣怀担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之职。其次,盛宣怀在淮军中饱受历练,先由湖北入陕西前线,又因“天津教案事起,畿疆戒严”,遂在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随之奔赴直隶。按照《行述》的说法,盛宣怀此时对军务十分着意,甚至与淮军名宿郭松林、周盛传等人“讨论兵谋”。最后,盛宣怀从军之旅的成绩也十分显著。在入幕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从候选直隶州被保举为“知府道员,并赏花翎二品顶戴”,职位晋升迅速。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中,盛宣怀本来一帆风顺的从军之旅戛然而止,《行述》的笔锋突然切换到同治十年直隶大水期间,他转而受父亲盛康之命劝捐赈灾之事:“辛未,畿辅大水,大父倡捐棉衣振米,命府君诣淮南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放。是为府君办理振务之始。”<sup>②</sup>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细究其中隐含的转折,不免令人生发疑问:盛宣怀为什么要突然就此抛弃发展良好的从军之路呢?在此次办赈之后,他再也没有尝试在从军之路上发展。

在办赈业绩之后,《行述》第三个环节转入对盛宣怀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活动的介绍。其中心意旨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盛宣怀在筹办轮船招商局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首先,强调盛宣怀是轮船招商这一洋务事业最终落实的重要推动者。文中指出,直到同治十一年五月间,盛宣怀向李鸿章、沈葆楨两人提出“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接洽地步,俟商船造成,随时添入,推广通行”的建议后,李鸿章亦“深韪其言”,才正式定义创设轮船招商局。其次,《行述》又暗示,盛宣怀在筹办活动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担任轮船招商局首任总办的朱其昂。按此说法,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后,即命盛宣怀会同朱其昂“酌拟试办章程”,而这份章程“上之江浙大吏,交相赞成,于是南北合筹,规模渐具”。<sup>③</sup>但一个明显疑点是:盛宣怀在筹办轮船招商局中的贡献如此突出,为什么没有成为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呢?

《行述》作为儿子们描述父亲生平事功的文本,具有自身特定的基调。具体说来,对于盛宣怀从投入李鸿章幕府到转入轮船招商局这一过程的叙述,可以说是盛宣怀凯歌行进的三部曲,即从军历练而晋升,继而办赈有功,其后又强势介入筹办轮船招商局事务。在这种基调之下,

① 盛同颐等编:《愚斋存稿》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9—10页。以下三个环节的具体介绍,都是基于这份文献的内容。

② 此段文字中的“振”字通“赈”,下文同。

③ 盛同颐等编:《愚斋存稿》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2),第9—10页。

盛宣怀的每一步活动都毫不例外地被描绘成人生赢家。对照关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风行说法，可以发现，后世研究者在以《行述》为基础资料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行述》的叙事基调所引导。其间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研究者们大都将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前的办赈环节，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甚至直接略过不谈。这其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疏漏。

那么，《行述》力图展现的盛宣怀诸事顺利的发展步调，与其列举的盛宣怀的三阶段经历之间，是否在逻辑和实践上实现了契合呢？按照时间顺序，盛宣怀这段从入幕到入局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从军、办赈和入局三个首尾相继的阶段。仔细观察盛宣怀此间的“辗转腾挪”，不难发现其中明显存在着蹊跷之处。

首先，盛宣怀从从军到入局的转向过于突兀。既然《行述》声称盛宣怀在军营中受到非同寻常的历练，其从军晋升之路又被描述得如此顺利，却为何在参与办赈事务之后，彻底脱离了依靠军功荣升之路呢？如果李鸿章安排盛宣怀进入天津机器局之类的军工企业，或仍是延续了军功荣升之路，轮船招商局则不仅主要属于民用工业，更重要的是，这项事业在倡办期间备受争议，前途并不明朗。那么，盛宣怀究竟出于怎样的机缘，才会放弃一条平稳的发展道路，而突然转向一条未知的道路呢？

其次，盛宣怀的事业发展道路何以突然发生变化呢？按《行述》所言，盛宣怀入幕后最大的历练是军营文员，其次是办赈事务，继而出任洋务企业经理人。早有学者明确指出，经营洋务建设事业的群体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官僚、买办和旧式商人。<sup>①</sup>盛宣怀虽然向来被视为官僚群体的代表，但以往无人能够证明，盛宣怀究竟有何资格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此时的盛宣怀并不像买办那样具备与西方接触的经验，也没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背景，李鸿章又为何会垂青于他呢？众所周知，李鸿章指派的第一个筹划轮船招商局事务的幕僚是林士志，而非盛宣怀，那么盛宣怀又如何能够超越林士志呢？仅仅依据《行述》中的那些溢美之词，根本无法发现盛宣怀继林士志之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资格究竟何来。

尽管盛宣怀在身后留下了迄今晚清人物中规模最大的个人档案，但遗憾的是，能够反映盛宣怀在同治十一年之前活动情况的资料，却极度匮乏。直到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之后，查询盛宣怀如何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问题才迎来了真正的转机。笔者正是在披阅该书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有关盛宣怀早期活动的关键线索。根据这些线索追查，可以断定《行述》的叙事，从一开始就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以盛宣怀最初入幕从军之路为例，其跟随李鸿章由鄂入陕、又由陕入直的过程，不仅远非《行述》所渲染的那样一帆风顺，甚至一度连盛宣怀能不能继续留在李鸿章身边，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在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上，第一次出现盛宣怀的名字。这份奏片的背景，是当天津教案引发危局之际，朝廷火速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并密谕其率军从陕西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sup>②</sup>该片上奏时，李鸿章还在西安，内中称：“再，吏部定章，丁忧人员留营效力者先应声叙奏明，臣春间奉旨督办军务，当经檄调丁忧在籍之道衔江苏候補知府许铃身、补用知府候选直隶州知州盛宣怀、湖北补用知县诸可权三员随营差委，相应遵章声明，恳恩飭部查照。”<sup>③</sup>

由该奏片可证，《行述》关于盛宣怀入幕时间的说法大致不差。其中称盛宣怀属于“丁忧人

①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4页。

② 《遵旨带军赴直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③ 《许铃身盛宣怀诸可权随营差委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71页。

员”，是因其母于同治七年冬去世，<sup>①</sup>未出守制之期。该奏片的中心意旨是李鸿章奏请朝廷允准许铃身、盛宣怀和诸可权三人继续跟随自己前往直隶。由于李鸿章当初带此三人从湖北去陕西时未遇阻碍，所以继续携其前往直隶，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問題。

然而，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带领许铃身、盛宣怀、诸可权三人继续前赴直隶的请求，竟然遭到朝廷断然拒绝。根据吏部议复之后给出的意见：“许铃身系准调之员，惟带往直隶差委与例未符，盛宣怀、诸可权二员所请调营差委，核与定章不符，应飭回籍终制。”<sup>②</sup>朝廷遂允准吏部意见，下达了旨意，这意味着盛宣怀等三人不仅无法待在直隶，而且必须离开李鸿章幕府。

李鸿章为三人前程考虑，很快设计了一条转圜之策。这个转圜的机缘，则是李鸿章于十月初推荐准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前往陕西督办军务的奏疏，得到了朝廷的允准。<sup>③</sup>于是，在接到吏部关于许铃身、盛宣怀、诸可权三人应“回籍终制”的意见后，李鸿章遂于十月二十四日上奏，称刘铭传“仓猝启行，正在需人之际”，而盛宣怀等三人“廉明耐苦，著有劳绩，实为军营得力之员，今夏随臣赴陕，于该省情形颇为熟悉”，故请朝廷准其三人“前赴刘铭传军营差遣委用，俾资得力”。清廷很快批示“著照所请”。<sup>④</sup>这就意味着，虽然盛宣怀不得不离开李鸿章幕府，但终究可以延续其从军之路了。

蹊跷的是，在朝廷允准盛宣怀转赴陕西之后，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始终再未发现有关盛宣怀行踪的直接记载。不过，综合若干间接信息来判断，盛宣怀转到刘铭传麾下接续的这条从军之路，很可能难以为继。

支持笔者这一判断的第一个理由，便是刘铭传此次督办陕西军务惨淡收场。同治十年正月间，李鸿章向丁日昌透露，此时率军驻扎乾州的刘铭传，即已陷入了“进退狼狈，不知是何结局”的地步。<sup>⑤</sup>同年七月间，朝廷闻俄国有“代为克复伊犁”并派兵“窥取乌鲁木齐”之说，遂命刘铭传率部出关，“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对于这一任务，刘铭传出于“出关以后，饷项军需，隔绝数千里，运道不通，何由接济”的极度担心，不愿接受，故而以病情加剧为由，决意告退。<sup>⑥</sup>朝廷本想“赏假一个月……一俟病痊，即行督率所部陆续西进”，但刘铭传至九月初，仍以“痼疾难瘳”为由，请求清廷续假三个月回籍调理。<sup>⑦</sup>清廷只得同意刘铭传病退之请，安排曹克忠前往陕西替代刘铭传统领准军各部，同时又命李鸿章负责善后。<sup>⑧</sup>不料在交接军务之际，刘铭传又遭到“措置乖方，不顾大局”的参奏，朝廷下令“交部严加议处”。<sup>⑨</sup>总之，刘铭传此次督办军务可谓劳师无功，如果盛宣怀确实始终在其军营之中，那么其前途的暗淡程度可想而知。

① 盛同颐等编：《愚斋存稿》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22），第9页。

② 《再调许铃身盛宣怀诸可权三员赴铭军差委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106页。

③ 《复奏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88—90页。

④ 《再调许铃身盛宣怀诸可权三员赴铭军差委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106页。

⑤ 《复丁雨生中丞》，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⑥ 《复陈暂难出关恳假离营养病折》，陈澹然编：《刘壮肃公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74—176页。

⑦ 《详奏转运情形并恳续假三月回籍调理折》，陈澹然编：《刘壮肃公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6），第177—179页。

⑧ 《曹克忠赴陕接统铭军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94—395页。

⑨ 《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523页。

另一个成为判断盛宣怀从军境遇的鲜明参照，则是此前与盛宣怀休戚相关的两人，即许铃身和诸可权的遭遇。刘铭传回师后，李鸿章不得不为当初跟随刘铭传入陕的人员做出一系列安排。李鸿章在同治十年年底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中，特地对许铃身、诸可权二人的去路做了如下安排：

丁忧道衔江苏候补知府许铃身、湖北补用知县诸可权，经臣上年奏调饬赴陕西刘铭传军营差遣。兹该员许铃身自同治八年八月十二日闻讣之日起，扣至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服满，诸可权自同治八年九月十一日闻讣之日起，扣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服满，迭据禀请遵例回籍起复前来。臣查刘铭传所部铭军现已分拨曹克忠接统，该员等在营均无经手未完事件，除批饬准销差离营回籍起复，仍回原省差委补用。<sup>①</sup>

从这份奏片中可以看出，许铃身和诸可权都前往陕西军营效力了，最后也皆因无功可保而不得不“销差离营”。而盛宣怀如果一直待在军营，恐怕也难逃这样的结局。这就意味着，盛宣怀此际的从军之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该奏片中为何独独少了盛宣怀呢？如前所述，资历相当的许铃身、诸可权、盛宣怀三人，自从跟随李鸿章入陕以后，经历也大体一致，那么盛宣怀此时为什么没有得到李鸿章的特意安排？如果他早已与许铃身、诸可权二人分道扬镳，他又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 二、大水之中的转身

带着上述疑问，再来看《行述》中有关盛宣怀参与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赈济活动的记载，便不能等闲视之了。在以往研究中，虽有学者对盛宣怀的这次赈灾活动偶有提及，不过是将之视为一项普通事功而一笔带过。而由前文可推知，盛宣怀从事直隶赈务之际，当初与之一起奉命从军的许铃身和诸可权仍在刘铭传军营之中。这难免令人生疑，清廷曾明令盛宣怀不得继续待在直隶，但他为何离开军营转而去办理直隶赈务了呢？据此猜测，此次赈务很可能是盛宣怀转换事业发展道路的关键。因此，《行述》在从军和入局之间插入的、关于直隶水灾赈务的叙述，很可能蕴含着某些意味深长的隐情。

由于以往学界对于同治十年直隶大水甚少注意，<sup>②</sup>在探讨盛宣怀如何能够参与赈务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之前，自然有必要对灾情和赈务的基本状况做出必要的揭示。就此次灾荒和赈灾的全局形势而言，其中心人物是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此前，李鸿章在江苏、湖北等地主政期间，不仅皆为时短暂，也没有遇到过十分严重的灾荒。至于同治九年永定河发生较为严重的水灾，则是在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前，并且大部分应对事务是由前任总督曾国藩处置的。<sup>③</sup>因此，同治十年永定河再次发生严重决口，可谓是李鸿章就任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独立面对严重灾荒的考验。更糟糕的是，这次决口的危害性也远非上年可比。

此次永定河决口，首要原因是直隶地区遭遇了罕见的高强度降水。李鸿章在永定河决口后

① 《许铃身诸可权回籍起复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90页。

② 较早概述此次水灾灾情的学者是李文海等人（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1840—19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美国学者李明珠（Lillian M. Li）则对此次水灾中赈济模式的特质进行了精确的归纳（*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00s-1990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68-272）。但除此之外的许多相关内容，迄今尚未讨论。

③ 《永定河漫口亟宜修复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82页。

第一时间向朝廷奏报称,因“自本年五月中旬以来大雨倾盆,日夜间作,平地水深数尺,为直省十余年所仅见……南、北运河迭报抢险,而永定情形尤重”,导致永定河于六月初六日丑刻,于南岸数处“漫越堤顶,大溜一涌而过”。<sup>①</sup>稍后,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又称此次“直境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后所仅见”。<sup>②</sup>借助当代气象学手段的分析,同治十年夏间此次降水量达到1064.4毫米,而上一次高于该指数的节点,恰恰是嘉庆六年(1801)的1111.9毫米。<sup>③</sup>

罕见的高强度降水,造成永定河连续出现决口,从而形成了大规模洪灾。九月初,据各被水州县查勘结果统计,天津、沧州、青县、静海、文安、保定等6州县“被灾极重”,大城等17州县“被灾次重”,大兴等65州县“被灾较轻”。因此,李鸿章向朝廷奏称:“本年水灾自嘉庆六年后数十年所未有,实较道光三年、同治六年为尤甚。”<sup>④</sup>

水灾如此严重,救灾所需要的总体投入非同一般。救灾投入的首要部分用于抢修河工。据时任永定河道李朝仪估算,此次抢修工程“共需银三十七万两零”。然而,李鸿章仍认为这个数字“需费过巨”,故而决定“暂酌减为二十六万两”。其来源则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由直隶设法筹措16万两,其二则“请旨饬拨有著之款”10万两。<sup>⑤</sup>朝廷亦应允先“由部库借拨银十万两”,将来由“山东、河南地丁银各五万两”筹还。<sup>⑥</sup>最终,对于这次堪比嘉庆六年的抗洪堵筑工程,官府的全部投入仅为26万两。因此,当李鸿章在奏折中特地提到当年嘉庆帝“特颁帑银一百万两兴工堵筑”的时候,<sup>⑦</sup>心中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

另一项困扰李鸿章的投入,则是救济灾民的巨大用费。李鸿章曾根据清代荒政的一般标准,估算“此次通省赈务……计非米五七十万石、银百余万两不能普遍经久”。他自己亦深知,在“目前财力奇穷”的情况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故而提出“以抚为赈”的变通办法,即官府不再开办大赈,而是“尽所筹银米之数,酌量各属被灾户口极次贫民,或统作一次散放,或分作冬、春两次散放”。<sup>⑧</sup>尽管此种变通办法大大降低了赈务所需,但官府能够提供的物资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到十月下旬,直隶统共筹措和接收到的救灾物资,只不过为米14万石、银27万两,<sup>⑨</sup>而这远不敷赈灾之需。例如,仅仅是被灾最重的天津等6州县,“约计放赈一月即需米十四万石、银八万余两”。<sup>⑩</sup>

在官府财政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鸿章很快把目光投向饬劝民间捐赈的途径。不过,在直隶境内采取“就地劝捐”显然成效不大,正如李鸿章所说,“直境著名痛苦,商富无多,集

① 《永定河南岸漫口自请议处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41页。

② 《复曾国藩》,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276页。

③ 转引自Lillian M.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00s-1990s*, p. 29.

④ 《查明本年直属被水情形筹款赈抚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80—381页。

⑤ 《永定河漫口河工筹款不敷请旨饬拨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75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242页。

⑦ 《永定河漫口河工筹款不敷请旨饬拨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75页。

⑧ 《复兼官顺天府尹礼部大堂万顺天府尹堂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25页。

⑨ 《查明秋禾被灾极重州县专案恩恩赈济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39页。

⑩ 《查明本年直属被水情形筹款赈抚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80页。

资有限”。<sup>①</sup> 天津筹赈局曾在水灾期间开展就地劝捐，最终仅有 1 万余两的收获。<sup>②</sup> 李鸿章也不惮于在奏折中明确提出，其劝捐的主要对象乃是江浙地区的绅士、富商。<sup>③</sup> 从最终结果来看，李鸿章的这一预期也没有落空。据其在《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中的最终统计，此次劝捐办赈所得棉衣、银米等项，统共折合银 81 万余两，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江浙地区。<sup>④</sup>

正是在这次劝捐助赈活动广泛开展之际，很长时间里在各类资料中都难觅踪影的盛宣怀，突然重新出现。至于其得以复出的首要契机，恰恰与李鸿章大力推广劝捐棉衣的活动有关。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因考虑到直隶灾区“民间经此流离，裋褐不完，御寒无具，困苦万分”，这才“备具函牍，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解津散放，以辅赈务之不逮”。<sup>⑤</sup> 李鸿章备函商劝之举大约是九月初付诸行动的，<sup>⑥</sup> 南省官绅亦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仅一个多月，便确认捐助 13 万多件。<sup>⑦</sup> 据李鸿章奏报，此次活动最终捐助总数为 281498 件，按当时“每件合银一两”的标准计算，此次棉衣捐助总价达到 281498 两。<sup>⑧</sup> 这几乎占此次捐赈总额的 35%，由此可见，劝捐棉衣乃是此次捐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在此次大规模捐办棉衣的活动中，盛宣怀的身影突然显现，并以出色表现赢得了李鸿章的青睐。同治九年十月以后，盛宣怀似乎隐匿起来，因为目前尚无任何资料能发现其踪迹。直到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出的两封信函中，盛宣怀才现身其间。第一封信是发给负责办理扬州粮台分局的徐文达，信中提及盛宣怀的内容是：“江淮劝办棉衣一节，经执事会同子箴都转设法募捐，魏温云世兄创捐巨资，赴沪购办……照章奏奖。盛村（按：原文如此，似应为‘盛杏村’，此处疑有脱漏）议将各棉衣提留济用，仍由沪上添购，赶早运津，筹画周妥，实为能事。顷据该守自沪禀报，已购二花二万二千斤，并旧棉衣八千件，搭船北运，尤见勇于为善，可敬可感，亦俟解到核明市价汇奖。”<sup>⑨</sup>

第二封信的接收人，正是上封信里提到的魏纶先（字温云）。该信涉及盛宣怀的文字称：

本年畿疆洪流泛滥……不得已而乞邻之举，于淮、楚、江、浙绅商劝办棉衣米石，接济瘠区，惠此遗黎。贤昆仲倡捐巨款，赴沪购办，可谓善承堂构，慷慨乐施，积而能散，流民受福不浅。顷据盛杏荪函报，已在沪购定洋布、二花若干，搭解来津，办法甚为简捷。<sup>⑩</sup>

比较两信可知，李鸿章与两人所谈，实为同一件事。第一封信中的“盛村”及“该守”，就是第二封信里指明的“盛杏荪”（按：盛宣怀字杏荪，“荪”与“村”两字在该文集中时有通假的情况）。也就是说，盛宣怀此时在上海正忙于办理棉衣助赈事宜。

按照两封信的时间推算，盛宣怀在上海从事棉衣助赈活动已有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在李鸿章发起商劝捐助棉衣不久，盛宣怀很可能就积极参与其中。前文言及，刘铭传于九月初向朝

① 《劝办直属灾赈援案请奖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4 册《奏议四》，第 401 页。

②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 年，第 307 页。

③ 《劝办直属灾赈援案请奖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4 册《奏议四》，第 401—402 页。

④ 《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5 册《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80—182 页。

⑤ 《外省捐赈请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4 册《奏议四》，第 423 页。

⑥ 《复金眉生都转》，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0 册《信函二》，第 317 页。

⑦ 《外省捐赈请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4 册《奏议四》，第 423 页。

⑧ 《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5 册《奏议五》，第 180 页。

⑨ 《复扬州粮台分局徐》，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0 册《信函二》，第 333 页。

⑩ 《复三品衔候选道魏纶先》，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0 册《信函二》，第 334 页。

廷奏请告退之际，淮军劳师无功的结局亦显露无疑。对此，盛宣怀不可能毫无察觉，否则很难解释，何以许铃身、诸可权在刘铭传军营时，盛宣怀却突然现身千里之外的上海。就此而言，在刘铭传奏请告退与盛宣怀积极投入直隶赈务这两件事情之间，很难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盛宣怀大概也决心与从军之路决裂了。如前所述，盛宣怀的宦途起步于入幕从军，李鸿章为盛宣怀的前途着想，才有向朝廷奏准，安排其随同刘铭传军营效力的转圜之举。但在全军尚未班师的情况下，身为随军文员的盛宣怀，却在千里之外从事着与军务毫不相干的事务，令人费解。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盛宣怀已经另有打算。原来，在倡办捐赈之初，李鸿章便以“若不从优给奖，不足以广招徕”为辞，奏请查照同治元年天津捐米章程之例，实施优惠力度更大的捐纳活动，并得到了朝廷的允准。<sup>①</sup> 换句话说，通过这次开办赈捐的机会，同样能够获取功名。因此，在随同刘铭传军营求取功名无望的情况下，将投身赈务作为进身途径，也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盛宣怀在此次赈务中格外出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捐助棉衣活动的多方投入。盛宣怀之父盛康积极响应李鸿章的号召，捐助棉衣2万件，<sup>②</sup> 是捐数最多的人士之一。<sup>③</sup> 但盛宣怀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介入了更为繁难的事务。按照李鸿章的规划，此次“募化江浙绅商、丝盐大贾捐助棉衣”，先期汇集在时任上海松沪厘局总办的刘瑞芬处，再设法运送天津。<sup>④</sup> 由此可知，盛宣怀出现在上海，正是为了协助刘瑞芬办理棉衣事宜。而从前述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的两封信来看，正是鉴于盛宣怀在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李鸿章才连连称赞他“办法甚为简捷”、“筹画周妥，实为能事”。

其次则是对购运赈米之事出力甚大。尚在赈务初始之际，李鸿章就鉴于直隶本省“赈米有限，势难普遍”的状况，故而在做出“派员携银分赴产米丰收之区设法购办”的措施外，还希望以胡光墉为首的南省绅商捐办米石杂粮，“辅官力所不逮”。<sup>⑤</sup> 盛宣怀积极参与此项任务。九月间，在扬州粮台和上海松沪厘局承担购办苏州、常州等地米石的任务时，他和另一委员“分投认贍三万石”之多。<sup>⑥</sup> 李鸿章亲自致信盛宣怀，赞称：“此次采购赈米，执事慨然分任，亲赴扬州、上海妥筹商办，力为其难……足见勇于为善，志在救民，可敬可感。”<sup>⑦</sup> 除此之外，盛宣怀还自行向灾区捐助“春赈米二千石”，按时价计算，折合银5000两。<sup>⑧</sup>

正是基于在此次赈务中的表现，盛宣怀历经一年又十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之中，并且迎来自成为“知府道员”后的第一次晋升机会。同治十一年八月，李鸿章在《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一折所附清单中，开列了如下内容：“三品衔候选道盛宣怀，上年驰往苏、沪、扬、镇等处，实力劝导，集捐甚巨，复在上海会同刘瑞芬等雇搭轮

① 《劝办直属灾赈援案请奖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01—402页。

② 《复翰林院吴大澂》，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43页。

③ 《外省捐赈请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23—424页。（李鸿章此处的统计表明，捐助棉衣数量达2万件的仅有盛康和魏纶先两人）

④ 《复松沪厘捐总局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18页。

⑤ 《请严禁遏杂折》、《劝办直属灾赈援案请奖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372、402页。

⑥ 《复扬州粮台分局徐》，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33页。

⑦ 《复候选府正堂盛》，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39页。

⑧ 《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奏议五》，第180—181页。



船，妥速运解，又捐春赈米二千石，洵属尚义急公，拟请赏加二品顶戴。”<sup>①</sup>

综合上述情况判断，盛宣怀投身赈务，更大可能是从军之路难以为继的脱身之计。据此而言，其当初的从军经历，恐怕很难单独成为他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资格保障。另外，根据这份奏折可知，盛宣怀得到“赏加二品顶戴”，根本不是如《行述》所称“从军逾年”的结果，而是因为参与办赈事务。认清《行述》中存在的这一时序错误，进而可以纠正另一个有关盛宣怀洋务事业起步背景的错误论述。这一错误，是在夏东元先生所著《盛宣怀传》一书中出现的。该书称，盛宣怀入幕后，因职务之便往来于津、沪等地，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如新技术、新思想等。盛宣怀的职衔也很快得到提升，从军逾年，即被推荐升知府、道员衔，并获得赏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晋升可谓速矣！<sup>②</sup>

夏东元这里力图说明，盛宣怀在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之前，便拥有了洋务经验，而往来天津、上海之间，又是他“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的最重要途径。可是，结合《行述》和前面的论述，可以断定，盛宣怀往来津、沪等地的经历，更大可能是在此次赈务期间实现的，而决不是发生在“赏花翎二品顶戴”之前。事实上，正是此次办赈经历，对盛宣怀初步积累洋务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办赈之后的入局

无可否认，盛宣怀在同治十年参与的救灾行动，并非一个新兴事务。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依靠参与此次赈务的机缘，盛宣怀才得以跻身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行列，从而开始走上洋务之路。然而，这里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背景，便是此次灾荒事件与筹议开创轮船招商局事务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即直隶水灾对确立轮船招商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对于轮船招商事宜的缘起，以往学界的通行叙述，大都是提及容闳等人在同治六、七年间发起的4次动议后，便转而关注内阁学士宋晋引发的关于中国近代航运业前途的讨论。仅有个别研究者曾敏锐地发现，其间存在着一段沉寂期，而轮船招商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再度活跃，与同治十年发生的直隶水灾甚有关系。<sup>③</sup>不过，由于受资料限制，过往的相关阐述十分疏略，此处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就在宋晋关于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造船业务的奏议中，其实就有浓厚的灾荒背景。在这份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递上的奏片中，宋晋指责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为靡费之举的一大理由，便是“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以视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别”。<sup>④</sup>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直隶赈务所需费用浩繁，而官府财力又严重不足。因此，无论宋晋的上奏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此次直隶大水无疑是诱发其奏停造船业务的直接因素之一。

此外，正如以往研究揭示的那样，随着宋晋上述奏议的出台，在朝廷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之间，关于轮船招商事宜的讨论也大大深化，而在此过程中，赞成态度最坚定、作用

① 《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赈出力酌拟奖叙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奏议五》，第181页。

② 夏东元：《盛宣怀传》，第7—8页。

③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361页。

④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185页。

也最大的非李鸿章莫属。<sup>①</sup>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同治十年直隶水灾之前,李鸿章并未参与轮船招商的筹议。那么,他为何会于此时如此积极、坚定地支持创办轮船招商事宜呢?又为什么要抛开闽、沪两厂的既有基础而力图另设轮船招商局?回应这些问题的突出线索之一,便是李鸿章在此次水灾期间因赈粮运输问题而遇到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盛宣怀也经历了这一困局,从而为其在航运问题上与李鸿章产生共鸣,埋下了伏笔。

直隶大水期间的赈粮运输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如前所述,由于直隶境内粮食供应不足,李鸿章不得不向外地特别是南方各省购运赈粮。但在完成大批赈粮的采买任务后,运力不足便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就《李鸿章全集》而言,最先向李鸿章明确指出这一情况的,正是盛宣怀。约在十月初,盛宣怀从上海致信李鸿章称,所购赈米因“轮船多不肯装,搭运殊难”。<sup>②</sup>至于造成运输艰难的直接原因,则是“以节近封河,商货皆须赶运,洋行多不肯装载。另雇向走闽广轮船运解,为时过促,尚未卜能运若干”。<sup>③</sup>毫无疑问,对于外国轮船公司的这般表现,李鸿章和盛宣怀非常不满。

在商轮运输陷入困境之后,也是盛宣怀率先建议,试图借用本土制造的兵轮运输赈粮。这方面的证据是,李鸿章于十一月十四日给负责江南轮船操练事宜的吴大廷去信,称“前因盛杏荪等采办赈米到沪,轮船夹板订雇为难,商请执事酌派‘威靖’等船装运”,但此举并不成功,吴大廷回信称,所商借之兵船“装载无多,英煤需费又巨,诚不合算”。<sup>④</sup>李鸿章亦随即告知盛宣怀:“沪局官轮不能多装……自可无庸商借。”<sup>⑤</sup>至于使用兵轮运粮的不合算之处,时任天津机器局总办的沈保靖还向李鸿章作出了一个更细致的说明:“又如今冬采买奉省赈粮,‘操江’轮船每次仅运千石,而煤价已在四五百金。嗣运沪米,欲借‘威靖’、‘测海’两船,闻‘威靖’仅可载一千三四百石,‘测海’仅可载七八百石,往返煤价,已需三千余金”。<sup>⑥</sup>

次年正月间,闽浙总督王凯泰在福建完成代为采购4万石赈粮的任务后,提出用福州船政局所属的“万年青”、“伏波”、“安澜”三艘兵船运往天津。结果这些兵船遇到了“轮船吃水过深,恐不能入大沽口”的问题,给接收工作造成了很大麻烦。<sup>⑦</sup>

此次水灾期间兵轮运输赈粮的体验,带给李鸿章很大警醒。宋晋当初奏请停办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造船厂时,提出的善后办法是建议将“已经成造船只,似可拨给殷商驾驶,收其租价”,<sup>⑧</sup>同时总理衙门亦劝说李鸿章等考虑“各局轮船由商雇买”的可行性。<sup>⑨</sup>李鸿章于五月间给朝廷的回奏中,却断然宣称:“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沪现造之船装载无多,商船皆不合用。”<sup>⑩</sup>这也表明,李鸿章早在此次回奏之前即已决心另创新局了。另外,盛宣怀在三月间也曾禀告李鸿章称:“福建已成轮船六号,上海已成轮船六号,俱非商船式样,其吃水之

① 徐元基:《轮船招商局创设过程考》,易惠莉、胡政主编:《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77—590页。(该文原发表于1985年)

② 《复扬州粮台分局徐》,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45页。

③ 《复江苏抚台张》,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46页。

④ 《复总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71—372页。

⑤ 《复河南候补道杨、候选府正堂盛》,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73页。

⑥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272页。

⑦ 《复王补帆中丞》,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408、428页。

⑧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185页。

⑨ 《致曾中堂》,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87页。

⑩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奏议五》,第109页。

深、用煤之多、机器煤炉占地之广，此之病皆无法可治。”<sup>①</sup>由此可见，在领用兵船问题上，盛宣怀的认识亦与李鸿章完全合拍。

应该说，盛宣怀因此次赈粮运输而得到李鸿章器重，被纳入其筹创航运业的范围，实属顺理成章之事。首先，在前述商轮运力不足、兵轮又不堪大用的情况下，盛宣怀最终能够圆满完成将所购赈粮从上海运至天津的任务，其费力程度可想而知，而李鸿章亦将之列为请奖的重要业绩之一。其次，盛宣怀在筹划赈粮运输期间对航运业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这就不难理解，在清廷于同治十一年二月三十日谕令李鸿章议复宋晋的奏议之后，<sup>②</sup>李鸿章立即“面谕”盛宣怀“拟上轮船章程”。<sup>③</sup>李鸿章最早委派津海关委员林士志负责筹议轮船招商事务，而在盛宣怀受命拟议章程之后，林士志便迅速被边缘化了。<sup>④</sup>至此，回望盛宣怀实现发展道路转向的整个过程，可以说赈务经历绝对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不过，总体来看，此次赈务对于盛宣怀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并不仅仅只有正面助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须从盛宣怀在筹办轮船招商局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谈起。

按照《行述》说法，盛宣怀从轮船招商局筹办活动伊始就居于重要地位。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早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中，就对这个说法提出了疑问。通过与李鸿章奏稿的对照，他指出：“虽然《行述》言明是由盛宣怀独自（向李鸿章、沈葆楨）建言（轮船招商之策），还在建议李鸿章组建招商局时担负了主要责任，李鸿章在关于开办该局的奏折中却只称此次建言来自‘朱其昂等’。……虽然盛宣怀看起来参加了总的规划，实际上朱其昂及其兄弟基于与航运业的关系，在招商局得以创办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sup>⑤</sup>在费维恺看来，航运业出身的朱其昂，比仅有幕僚经历的盛宣怀，更有筹办招商事宜的优势。李鸿章的奏折没有提及盛宣怀，那么是否意味着《行述》关于盛宣怀参与筹办招商局的说法完全不可靠呢？对于这一疑问，费维恺无法找到答案，只好转而讨论盛宣怀进入轮船招商局后的作为了。

正如费维恺所言，在李鸿章向朝廷正式奏报创设轮船招商局的奏折中，首任总办朱其昂是被提及的首要人物，位居其次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后来没有进入轮船招商局的胡光墉（即胡雪岩），盛宣怀的名字则始终没有出现。前文业已表明，盛宣怀很早便奉李鸿章之命筹议招商事务，并且，盛宣怀不仅参与筹议事宜的时间早于朱其昂和胡光墉等人，而且在整个筹办过程中都未缺席。<sup>⑥</sup>那么，盛宣怀为什么会在李鸿章的奏折中完全消失身影了呢？通过仔细梳理此次赈务活动，可以发现，李鸿章在此期间与朱其昂、胡光墉等人的交集，很可能是揭开这一谜团的一条重要线索。至于探查这条线索的起点，应该从招商局主持人人选的最初筹议开始。盛宣怀曾在三月间拟议的章程中宣称：“轮船官本重大，官不宜轻信商人，商亦不敢遽向官领，必先设立招商局创成规矩，联络官商，而后官有责成，商亦有凭藉，是非素谙大体、取信众商者不能

① 《上李傅相轮船章程》，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资料长编》上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44页。

③ 《上李傅相轮船章程》，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资料长编》上册，第13页。

④ 易惠莉：《易惠莉论招商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⑤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p. 63. (此处引文是笔者自行翻译，与中文版文字略有出入)

⑥ 易惠莉：《易惠莉论招商局》，第5页。

胜任。请遴选公正精明，殷实可靠道府两员，奏派主持其事。”<sup>①</sup>

按此意见，轮船招商局主持人应是一位“官商”。如夏东元所说，盛宣怀在这里其实有毛遂自荐的意思。李鸿章于四月间给总理衙门的一份咨文中，表达了对轮船招商局主持人任职条件的看法：“窃以为更宜物色为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事关大局，将来非有大力者担当经营，曲体商情，联上下为一气，恐办不到。”<sup>②</sup>表面上，李鸿章也非常认可“官商”作为轮船招商局主持人的优先性，与盛宣怀意见并无二致。但实际上，李鸿章此际所心仪的人选很可能不是盛宣怀，而是同样有着三品衔知府道员身份、也同样在上年赈务中有积极表现的朱其昂。

关于朱其昂的出身，及其具有的种种优势，以往学者已有详尽研究，<sup>③</sup>无需赘述。然而，对于朱其昂怎样得到李鸿章赏识的问题，以往论述并不充分。有关两人最初的交集，以往大都采用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递上的《试办招商轮船折》的说法，即李鸿章趁本年夏间“验收海运之暇”，“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酌拟轮船招商章程”。<sup>④</sup>这种看法存在的疑问是，此前李鸿章委派筹议章程的林士志和盛宣怀，都是其幕府中人，可见其态度慎重，如果此时方与朱其昂初识，李鸿章何以能够立即交付其如此重要的任务呢？

事实上，朱其昂与李鸿章的交集，肯定早于同治十一年夏间。朱其昂的名字在《李鸿章全集》中首次出现，是在同治十一年八月李鸿章为南省官绅捐赈请奖的奏折之中。与盛宣怀一样，李鸿章对朱其昂的赈务业绩同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三品衔道员用浙江补用知府朱其昂，留办截漕，交兑折价，捐资雇船，救护饥民，实力耐劳，拟请交部从优议叙。”<sup>⑤</sup>由该奏折可知，自同治十年直隶大水掀起捐赈活动之后，朱其昂表现积极。基于赈务期间曾有过联系，李鸿章与朱其昂在同治十一年夏间的会晤当然不会是初识。

至于胡光墉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活动，则是另一番微妙情形。胡光墉当时已是著名的“红顶商人”，为江浙绅商群体的头号人物。加之早先曾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经历，就资格和能力而论，胡光墉是竞争轮船招商局主持人的有力人选。但胡光墉与左宗棠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又素来不睦。这就不难理解，尽管李鸿章起家于上海，也曾为官于两江地区，但就目前所见，在同治十年以前，尚未发现李鸿章与胡光墉之间有过直接交往的记录。

同治十年直隶大水爆发后，胡光墉才与李鸿章有了密切交往。在李鸿章发起向南省官绅劝赈之举后，胡光墉立即“捐解棉衣一万件”，从而成为第一批积极回应的人士之一。这种表现显然赢得了李鸿章的器重，也使李鸿章对胡光墉寄予了更多期望。这表现在，李鸿章于九月下旬连续致信胡光墉，并称“执事为东南领袖，仍望广为劝募”。<sup>⑥</sup>面对李鸿章的借重，胡光墉也做出了愿意效力的表示，除“复添制棉衣五千件”外，还以“禀奉母命”名义“倡捐购办牛种耕具库平银一万两”，成为整个赈务活动中捐助力度最大的绅商。<sup>⑦</sup>而李鸿章也投桃报李，先后两

① 《上李傅相轮船章程》，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年谱资料长编》上册，第14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906页。

③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28—29页。

④ 《试办招商轮船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奏议五》，第258页。

⑤ 《查明南省官绅劝捐办出力酌拟奖叙折》所附清单，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奏议五》，第182页。

⑥ 《劝办直属灾赈援案请奖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01—402页；《复布政使衔福建候补道胡光墉》，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第331页。

⑦ 《胡光墉等捐赈请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53页。

次为胡光墉上奏请奖。<sup>①</sup> 在此次赈务期间，胡光墉是唯一得到如此待遇的人物。

无疑，在这一轮通过赈务建立的交往中，李鸿章与胡光墉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从而大大拉近了距离。也正是在此之后，李鸿章才有试图延揽胡光墉加入筹办轮船招商局之举。在朱其昂受命回到上海开展招商活动后不久，时任天津道丁寿昌和津海关道陈钦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于十月间共同致信朱其昂称：“第局内之事……即与胡雪岩观察合谋商办。”当李鸿章得知胡光墉愿意到上海与朱其昂会面的消息后，对后者的入局更抱期望。李鸿章稍后给朱其昂的一份批文中称：“胡道（按：即胡光墉）熟悉商情，素顾大局，既与朱守晤商，当可妥商合伙。”<sup>②</sup> 可以肯定，正是基于这种预期，胡光墉的名字才被李鸿章列入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奏折之中。但事实表明，这仅仅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就在李鸿章上奏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就不无懊丧地告知丁寿昌，胡光墉以“所虑甚多”为辞，“似决不愿入局搭股”。<sup>③</sup> 而李鸿章、胡光墉两人自直隶办赈以来所达成的良好关系，亦就此烟消云散。当然，胡光墉出局后，盛宣怀在招商局中的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还未达到掌控全局的程度，对此已有另文探讨，此不赘述。<sup>④</sup> 至于其后来对招商局的全面掌控，因涉及头绪已非本文所能容纳，且俟下一步研究。

## 结 论

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决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由从军—办赈—入局三部曲构成的曲折过程，也是盛宣怀个人发展道路经历了重大转向的结果。同样，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不是一个简单落实顶层设计的企业建设活动，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和脉络相互交织的结果。

研究有助于拓展有关盛宣怀以及洋务运动研究的视角。以往囿于学科分野，该领域研究者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史视角出发，进行分门别类式的研究。本文则表明，盛宣怀从军营文员到洋务人员的这个转换过程，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历程，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复杂互动的过程，必须以实践活动为线索，运用复合式研究视角和取向才能加以把握。另外，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深刻认知文献自身的特定属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行述》对盛宣怀筹办招商局作用的夸大，与李鸿章奏折对胡光墉入局地位的抬高，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无论是面对一手还是二手资料，研究者都不能仅仅着意于从中摘取作为论据的信息，而忽视了这些作为独立文本的资料所蕴含着的特定叙事脉络。如若不然，则很容易陷入被文本的基调所诱导而不自知的境地。

〔作者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武雪彬）

① 《外省捐赈请奖片》、《胡光墉等捐赈请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奏议四》，第423—424、453页。

②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231、232—233页。

③ 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第245页。

④ 参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even the manufacture of handmade paper.

**Disaster Relief in Zhili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and Sheng Xuanhuai' s Path to the Yangwu (Westernizing/Modernizing) Movement** Zhu Hu (79)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heng Xuanhuai' s journey toward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was his involvement in the setting up of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ship Navigation Company, seen as deliberately arranged by Li Hongzhang. In fact, his journey toward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yangwu*) was a tortuous one. In particular, it was the occurrence of an extraordinary flood in Zhili Province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Tongzhi Emperor that finally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tting up of the company. Exploring this process in depth and revealing Sheng' s personal history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yangwu* enterprise from top-level design to practice and thus enable us to expand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Jenks' Visit to China and Late Qing Monetary Reform** Cui Zhihai (92)

In 1904, the American monetary expert Jeremiah Jenks came to China to help the Qing government carry out monetary reform. Each side claimed to be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ir purposes were at odds. The Qing government want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trieve the fiscal losses caused by the fall in international silver prices and the deficits in gold and silver conversion after the 1870s.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nclude Chinese currency in the New York-based dollar group to compete with the longtime dominance of the British pound, which would have left the US government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main reason the Qing government rejected Jenks' proposal for monetary reform was that it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interests and the country' 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its failure cannot be simply ascribed to the resistance of local interests represented by the late Qing "localization of currency issuance." Jenks failed to provide a truthful and accurate report of the talks to foreign circles and the US government, partly because he wished to take credit for himself but partly also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Sparta' s "Fear": The "Thucydides Trap"** Yan Shaoxiang (109)

Thucydides stressed that 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is inspired in Sparta that was the root cause of Peloponnesian War.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very much at odds with his record of the "fifty years of peace." A review of Sparta' s policy toward Athens and other city-states reveals the bellicose nature of Sparta' s foreign policy. Thucydides' judgmen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academia because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superficial pretexts and underlying causes; moreover, it has gained wide currency because it falls in with the theore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realist school in today'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ther seen as historical fact or as a theoretical principle, the "rise" and "fear" that Thucydides used to explain the outbreak of Peloponnesian War and the concept of the "Thucydides trap" that emerged from it